臺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三期
2010年12月　頁267～294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韓愈五原作於何時？

——兼論韓愈道統說之發展時程

方　介*

提　要

韓愈文集中，以「原」名篇者五：〈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毀〉，朱熹謂其篇目相同，當是一時所作，且皆作於量移江陵以前。近今學者則多謂作於被貶陽山時，然亦有謂作於郴州，或作於元和八年以後者。究竟何者較爲可從？是否一時之作？有無其他可能？前賢所論，多乏鐵證，難以釋疑。因此，本文先就相關詩文、思想脈絡進行探討，指出五原脈絡相通，應是一時之作，且應作於貞元十九年左右，在京任官時；再就前人不同說法加以檢視，指出其中疑、誤；最後據以考察韓愈道統說之發展時程，指出〈原道〉乃韓愈學問成熟，火力最旺之壯年所爲，絕非晚年定論。透過此一探討，不唯可使韓愈創作五原之時間、地點得以釐清，心態、處境得以重現，亦當有助於了解五原在韓愈畢生倡爲古文、興儒排佛的進程中，具有怎樣的樞紐地位。

關鍵詞：五原、原道、道統、排佛、陽山

本文於99.08.31收稿，99.11.12審查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Time when Han Yu Wrote the Five Articles on "Tracing the Cause" and the Developing Procedure of Han's Confucian Orthodoxy Theory

Fang Jie*

Abstract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Han Yu, there are five article titles started with the word "*yuan*" (which means "tracing the cause"): "Tracing the Cause of the Tao", "Tracing the Cause of Human Nature", "Tracing the Cause of Human Beings", "Tracing the Cause of Ghosts", and "Tracing the Cause of Slander". Since the titles of these articles are similar, Chu Xi presumed that they should be written at the same time, before Han was remitted and transferred to Jiangling. But most of the scholars nowadays believe that they were written when Han was banished to Yangshan, or when he was in Chenzhou, or after 813 A.D. Which statement is believable? Were they written at the same time? Are there any other possibilities? As a matter of fact, former scholars did not have any irrefutable evidence.

Investigating Han's poems, articles and sequence of ideas, this paper first confirms that the five articles were written at the same time, around 803 A.D., when Han secured an official position in the capital of the cou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ry. The second part examines the various arguments of our predecessors and points out their questionable aspects and errors. The third part proves that "Tracing the Cause of the Tao" was not written in Han's remaining years but in his prime of life,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ing procedure of Han's Confucian orthodoxy theory.

Keywords: Five "*yuan*" (the Five Articles on "Tracing the Cause"), tracing the cause of the Tao (Confucian philosophical principles), Confucian orthodoxy, to exclude Buddhism, Yangsh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韓愈五原作於何時？

——兼論韓愈道統說之發展時程

方　介

一、前　言

韓愈文集中，以「原」名篇者五：〈原道〉、〈原性〉、〈原人〉、〈原鬼〉、〈原毀〉，韓愈未言作於何時，但，朱熹嘗言：

> 此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諸篇也，然則皆是江陵以前所作。程子獨以〈原性〉爲少作，恐其考之或未詳也。[1]

案韓愈於貞元十九年（西元803年）十二月被貶陽山，[2] 二十一年八月[3]移江陵府法曹參軍，同年十二月九日上書於兵部侍郎李巽，並獻舊文一卷，朱熹疑即五原，而未遽斷。近今學者據韓愈〈謝郴州刺史李伯康寄紙筆〉詩所謂「虞卿正著書」一語，謂五原乃貞元二十年冬稍前稍後或二十一年夏秋以前作於陽山，[4] 似

---

[1] 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卷4，頁127，〈原性〉題下注。

[2] 本文述及韓愈事蹟及作品繫年，皆據羅聯添：《韓愈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11月增訂再版），不另加注。該書未言者，則另加注說明。

[3] 本年八月改元永貞。

[4] 羅聯添：〈韓愈原道篇寫作的年代與地點〉，見氏著：《唐代文學論集》下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5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做爲朱說佐證，故自此說面世之後，學者多謂五原作於陽山。[5]然亦有謂始作於陽山，完成於郴州，[6]或作於元和八年（813年）以後者。[7]究竟何者較爲可從？有無其他可能？筆者以爲，可由相關詩文、思想脈絡進行探討，當有助於此一問題的釐清，進而了解韓愈道統說之發展時程，故擬就管見所及，略論如下，以就教於方家。

二、五原作於何時？

由韓愈與張籍往來書信可知，韓愈早年排佛，多以口舌相爭，張籍勸他著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他說：

>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于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8]
>
> 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9]
>
> 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竢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吾子其

[5] 如張清華：〈韓愈的道、道統說及《五原》的寫作時間辨析〉，《韓山師範學院學報》26卷4期（2005年8月）。劉眞倫：〈五原的創作與道統的確立——兼論韓愈陽山之貶與文風之變〉，《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3卷1期（2006年1月）。

[6] 洪流：〈韓愈五原始作於陽山〉，收入《韓愈與嶺南文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9月）。

[7] 如童第德選注：《韓愈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10月），頁229。鄧小軍：〈唐代的中國文化宣言——韓愈《原道》論考〉，《孔子研究》，1991年4月。

[8] 唐・韓愈撰，民國・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韓昌黎集》，1975年3月）（以下簡稱《韓集》）卷2，頁77，〈答張籍書〉。

[9] 同上，頁78，〈重答張籍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何遽感感于吾所爲哉？……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10]

案韓愈答張籍二書作於貞元十四年冬，時年三十一，甫過而立，正任汴州觀察推官。[11] 由此二書可知，韓愈當時雖已自居爲孔、孟、揚雄之傳人，但因顧忌較多，猶未著書排佛。其後，汴州軍亂，輾轉由徐州幕府赴京，而於貞元十七年秋冬出任四門博士。當時，四方學子皆來求教，韓愈亦以師自命，作〈師說〉曰：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其可怪也歟？……李氏子蟠年十七，……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12]

案〈師說〉約作於貞元十八、九年，[13] 當時士大夫往往尊仰高僧爲師，自稱弟子，但士大夫間，卻以相師爲恥。韓愈此文無異公然於儒門樹幟，招收弟子，傳揚儒道，以與佛門相抗。柳宗元指出：

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14]

---

10 同上，頁 79 。

11 羅聯添：〈張籍上韓昌黎書的幾個問題〉，《唐代文學論集》下册，頁 459 。

12 《韓集》卷 1 ，頁 24-25 。

13 案清・徐松：《登科記考》（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 8 月）載李蟠於元和元年以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前此當已及進士第，而貞元二十年停舉選，舊注謂蟠爲貞元十九年進士，當可從。韓愈《師說》未言其及第，當作於十九年及第前。而貞元十八年正月，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所薦十人中無李蟠，可見，〈師說〉應作於十八年二月至十九年及第前。而若李蟠遲至二十一年始及進士第，則因韓愈已於十九年冬被貶陽山，李蟠請學亦必在此前，故〈師說〉之作，當在十八、九年。

14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1974 年 12 月）卷 34 ，頁 541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見，韓愈此舉確實引起了軒然大波，但，他顯然不惜一切代價，要向佛門、流俗宣戰，故當「貞元十九年春，浮屠文暢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時，[15]韓愈認爲「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乃贈序曰：

> 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16]

此序不僅質問浮屠「孰爲而孰傳之」，暗諷其「不知所自」，幾若禽獸；[17]而

---

[15] 《韓集》卷 4 ，頁 147 ，〈送浮屠文暢師序〉。

[16] 同上，頁 148 。

[17] 案孟子曰：「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使禹治之，……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 使民不得衣食，…… 而禽獸至，……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滕文公下〉，《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年 10 月），頁 271-273 。又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五穀不登，禽獸偪人。……舉舜而敷治焉，……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后稷教民稼穡，……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滕文公上〉，頁 259 。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且將矛頭直接指向那些信佛的文士，斥爲「不仁」，口氣十分凌厲，[18] 可見，此時他已突破答張籍時「豈敢昌言排之」之心態，不惜形諸文字，大張旗鼓闢佛。當時佛教講究師傳、爭言道統，[19] 所以，他不僅要作〈師說〉「傳道」，而且要作此序標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所「傳」之道，強調這才是「中國之人世守」之道，以與佛教所謂傳法、傳道相抗。試觀〈原道〉所謂：

> 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后爲之衣；飢，然后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后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

子屢言堯、舜、禹、武王、周公拯救中國之人脫離洪水、猛獸之迫害，得以安居樂業，又教以人倫，使與禽獸有別。並痛斥楊、墨「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而欲上承三聖以拒楊、墨。韓愈此序謂聖人教民宮居粒食，並歷述堯、舜、禹至周公、孔子之相傳，顯自孟子而來，而此序首言：「有墨名而儒行者，……可以與之遊乎？」亦顯以墨比浮屠，而上承孟子之說，暗斥浮屠無父、無君，幾與禽獸無異。清・林紓曰：「說到浮屠，孰爲孰傳？此圖窮匕現，逼人甚矣。而頂筆卻推開浮屠，但論禽獸，言禽獸不知道，故易罹害，人知道，故獲安居而粒食，此時仍引浮屠同爲人類，見得前此禽獸二字不是罵他，……若不知所自，仍禽獸耳。」頗能切中要旨。林紓語見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 年 4 月），頁 1616 。

18 此序首言：「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儒名而墨行者」即指柳宗元等信佛文士，雖在孔子門牆，卻從夷狄之教，故揮斥之。

19 湯用彤指出：「佛教宗派之爲教派，其標志之一，即自以爲是傳法之道統。而道統之爭，當與南北朝時道教與佛教之爭有關。……在中國佛教宗派史中，傳法爲一關鍵性概念，于隋唐後方盛爲流行，前此則不然也。……此在佛書中稱爲傳燈。……印度佛教部派，只重學說之同異，而甚少言及師承。……而中國佛教于隋唐以後，師資傳授乃漸受注意。」見氏著：《隋唐佛教史稿》（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 年 4 月），4 章 10 節，頁 171-172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20]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21]

便知此序已具〈原道〉雛形，主要論述大旨相同。而韓愈既在此時強調：「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並且已有相當清楚的構思，便有隨即再作《原道》加強論述的可能。因此，若就韓愈任四門博士，以師自命，極力想要「傳道」、闢佛之言行、心態以觀，應已具備撰述〈原道〉等文之迫切動機與客觀環境。

再就〈原性〉以觀，篇末曰：

今之言性者異于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22]

這番話當是針對李翺〈復性書〉而言。試觀〈復性書〉曰：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23]

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

[20] 《韓集》卷 1 ，頁 9 。
[21] 《韓集》卷 1 ，頁 10 。
[22] 《韓集》卷 1 ，頁 13 。
[23] 清・董誥奉敕編：《全唐文》（臺北：大通書局， 1979 年 7 月）卷 637 ，頁 8169 ，〈復性書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24]

佛、道二教主張滅情、去情，李翺以情爲妄、爲邪，主張滅情復性，明顯受到佛、道二教影響。他的〈復性書〉雖以〈中庸〉爲本，但言復性之方曰：「弗慮弗思……齋戒其心」；[25]「知其爲邪，邪本無有，心寂然不動，邪思自息」，[26]實與佛、道二教靜修方法相近，[27]故韓愈指其「雜佛、老而言」，而另作〈原性〉與之相抗。〈原性〉謂性有三品，「情之於性視其品」，上品之人對於七情可以「動而處其中」，「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就無須滅情、去情。

〈復性書〉作於貞元十八年，[28]李翺曾與陸傪論及其旨，陸傪大爲讚許，謂「子之言，尼父之心也。」[29]可見，此書一出，必受矚目。韓愈既以孔子傳人自居，欲傳儒道、闢佛老，就應及早提出自己的性、情論述，以正視聽。因此，〈原性〉之作當在此後不久，[30]亦恰與前述〈師說〉、〈送浮屠文暢師

[24] 同上，頁 8173，〈復性書中〉。

[25] 同上，頁 8171。

[26] 同上。

[27] 陳弱水謂：「〈復性書〉是在漢儒性善情惡說大背景下，借了佛教思想的架構，利用道教、道家的材料，依循儒家的基本價值，建構一套嶄新的儒家心性修養理論。」詳見氏著：〈《復性書》思想淵源再探——漢唐心性觀念史之一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9 本，第 3 分（1998 年 9 月）。

[28] 羅聯添：〈李翺年譜〉，收入《唐代詩文六家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 年 7 月），頁 490。

[29] 〈復性書上〉，頁 8171。

[30] 韓、李交往密切，貞元十二年在汴州相識後，屢相論學、論文，十六年李翺娶韓愈亡兄女，十七年九月韓爲李翺祖父楚金作墓誌，十八年李翺在滑州任職，曾寄新作予裴度，裴度答書言及韓愈，亦可見韓、李此時交往之密。以常情度，〈復性書〉成，寄予韓愈之可能性頗高，故謂韓愈〈原性〉作於此後不久，應有相當可能。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皇甫湜初識韓愈在貞元十九年，（繫年考證見羅聯添《韓愈研究》頁 186-187）其〈孟子荀子言性論〉謂「性之品有三」，取自韓愈〈原性〉，所舉諸例亦多簡括〈原性〉而得，（詳見拙著：〈皇甫湜的聖人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2 期，2003 年 3 月）疑即此時見〈原性〉而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序〉之寫作時間及〈原道〉可能之撰述時間相近。故程子「以原性爲少作」的確有誤，而朱熹謂五原「當是一時之作」則比較可信。

再就〈原毀〉以觀，韓愈早期在外州幕府，既不敢昌言排佛，也未大張旗鼓招收弟子，表現比較低調，招到忌毀的可能性也就比較低。入京任四門博士以後，火力全開，極爲搶眼，自易遭忌、被謗。故柳宗元謂其作〈師說〉以後，「群怪聚罵」，無法安居長安。韓愈〈與陳給事書〉亦曰：

> 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31]

此書作於貞元十九年，書中詳言遭忌而漸被疏遠的情形，並獻文「急於自解而謝」，[32] 可見其時正處謗毀之中，應有寫作〈原毀〉之可能。〈原毀〉謂古之君子責己重，故不怠；韓愈亦自責「道不加修」，可謂「不怠」也。〈原毀〉謂今之君子因「怠」與「忌」，而好毀謗他人；韓愈「文日益有名而同進者忌」，對此體驗至深，故〈原毀〉描寫衆人忌毀良士之情狀，「未嘗肆詈，而惡薄之人情，揭諸篇端，一無所漏」，[33] 當即此一時期有感而作。文末曰：「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可見，此文旨在揭露俗弊，大有關於治道，亦與〈原道〉、〈原性〉同。

他如〈原人〉曰：

>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

31 《韓集》，卷 3 ，頁 111 。
32 同上，頁 112 。
33 林紓語，見《韓愈資料彙編》，頁 1601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34]

此以夷狄、禽獸並稱，強調人、禽有別，人爲夷狄、禽獸之主，不可指禽獸爲人，實與〈送浮屠文暢師序〉以禽獸、夷狄暗諷浮屠之思維一致。至於〈原道〉曰：

>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35]

此即〈原人〉所謂「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能使夷狄、禽獸「得其情」的「爲主之道」。試觀〈原道〉篇末主張「人其人，……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36]便知韓愈認爲信從夷狄之教的僧徒，雖與禽獸「皆人也」，而實不可謂之爲「人」，故須「人」其人，使之棄佛還俗，改從先王之教，而各得其養。可見，〈原人〉所言，實與〈原道〉桴鼓相應，當亦一時之作。

至於〈原鬼〉一文是否同時所作？試看〈原道〉曰：

> 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37]
>
>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38]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先聖先王所教，不僅關乎生，也關乎死；無論事人、事鬼，都有其禮，相沿成習。但在佛、道二教衝擊下，傳統習俗、觀念都產生了

---

[34] 《韓集》卷 1 ，頁 15 。
[35] 同上，頁 10 。
[36] 同上，頁 11 。
[37] 同上，頁 8-9 。
[38] 同上，頁 10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很大的改變。因此，韓愈不僅作〈原道〉強調先王之教的完善周全，而且依據傳統儒教鬼神觀作〈原鬼〉，針對一般人最易生惑，也最易受佛、道二教誘引的鬼神問題，提出自己的解釋，[39] 這樣的論述，顯然亦與〈原道〉相呼應，故亦可能作於同時。

總之，五原不僅篇目相同，而且脈絡相通，朱子謂是一時所作，應當無誤。而由韓愈入京任四門博士以後，作〈師說〉、〈送浮屠文暢師序〉，極力想要「傳道」、闢佛、倡古文之心態、言行及處境以觀，都確有撰述五原之可能。因此，筆者以爲，五原當即作於貞元十九年左右。雖有學者認爲，「此時期他的知識水平、實踐經歷和理論修養都未達到氣候」，[40] 但若果眞如此，貶至陽山，前後相差不過數月，也未必能使學養大進。韓愈在京任四門博士，是學官，不僅有空讀書、寫作，也因身處京師人文薈萃之地，見聞更廣，與人論學、論戰之機會更多，而使他的學問、文章、乃至道德、勇氣都達到了成熟而可高飛的階段。試看當時裴度所作〈與李翺書〉曰：

> 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

此書約作於貞元十八年，[41] 可見，韓愈此時爲文「往往奔放」，已極引人注

---

[39] 詳見拙著：〈有鬼有物——韓愈〈原鬼〉及相關詩文探析〉，《臺大中文學報》32 期（2010 年 6 月）。

[40] 洪流：〈韓愈五原始作於陽山〉，頁 475 。

[41] 案裴度此書曰：「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貺新作二十篇。」而白居易〈傷唐衢〉曰：「伊昔未相知，偶遊滑臺側。同宿李翺家，一言如舊識。……君歸向東鄭，我來遊上國。」《白居易集》（臺北：里仁書局， 1970 年 10 月）卷 1 ，頁 1596 。可見，裴度此書作於唐、白遊滑州後。據《白居易集》所附顧學頡《白居易年譜簡編》，白居易貞元十七年春在符離，秋在宣州，十八年冬在京試書判拔萃科，十九年春授校書郎。顧譜謂白居易於滑州李翺家識唐衢約在貞元十七年前後。但，筆者以爲，韓愈〈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曰：「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扇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韓集》卷 7 ，頁 317 。可見，李翺九月還在汴州，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目。如〈送孟東野序〉以三十八個「鳴」字跳躍到底，不斷轉換句法，便是最佳例證。[42] 但，裴度對韓愈此種作法，頗不以爲然，故批評他「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以韓愈之好勝，面對此類批評，最好的回應，應當就是寫〈原道〉。〈原道〉行文正是「高之、下之、詳之、略之」，極盡怪變之能事，[43] 但，主題卻是如此正大，不僅關乎國計民生，甚至關乎千秋萬世，可見，韓愈不唯以文爲戲，亦能以之明道、立制，當可使裴度等人之批評不攻自破。[44] 故筆者以爲，韓愈在京之時，面對排山倒海而來之批評，定然愈戰愈勇，才會逼出〈原道〉這樣的文章。〈原道〉氣勢磅薄，攻擊力很強，其他四篇，也各有

白遊滑，應在貞元十七年冬至十八年秋白居易赴京應試前。然裴度書末曰：「弟素居多年，……窮陰凝沍，動息如何？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內，固多適耳。」知必作於窮冬。若是十七年冬，行程太緊，且李翺當是初至滑州任職，唐、白立即到訪之可能性小，似以十八年較爲可能；且韓愈十七年秋冬始任四門博士，亦以次年招致衆人批評之可能性爲高，故裴度此書應可推定爲貞元十八年冬所作。

42 案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曰：「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韓集》卷 6 ，頁 257 。據《登科記考》知孟郊貞元十二年及進士第，隔四年，則爲十七年。是年三月，韓愈自京歸洛，有〈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詩，知此時孟郊尚在京師，依例當是十月參選，次年派任溧陽尉，〈送孟東野序〉謂其「役於江南」，知作於十八年赴任前。〈祭十二郎文〉題下舊注謂：「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蓋貞元十八年有〈送孟東野序〉，即是年爲十九年」，應當無誤。華忱之〈孟郊年譜〉謂孟郊貞元十六年或次年在洛陽選爲溧陽尉，又謂〈送孟東野序〉作於十九年，恐不可從。（附錄於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頁 565 、 566 ）清・儲欣評此文曰：「通篇數十鳴字，如迴風舞雪。」清・吳楚材、吳調侯曰：「句法變換凡二十九樣，如龍之變化，屈伸於天，更不能逐鱗逐爪觀之。」引自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頁 935 、 1125 。

43 如清・劉大櫆評〈原道〉曰：「老蘇稱公文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惟此文足以當之。」引自王文濡校註：《古文辭類纂評註》（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73 年 7 月）卷 2 ，頁 3 。

44 詳見拙著：〈談韓愈以文爲戲的問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16 期（ 2000 年 3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批判，與〈師說〉、〈送浮屠文暢師序〉一樣，都富有主動出擊、匡時救弊的精神。也就是這樣的精神和銳氣，使他更受矚目，也使他在貞元十九年冬被拔擢爲監察御史。而做爲御史，放眼天下，以爲己任，氣勢更高，更加敢言，也更當就此關係國計民生、人倫教化之大問題爲文以論，[45]故筆者以爲，貞元十九年前後，無論做爲博士或御史，都有可能促成五原的誕生，未必須待貶後。何況，當他必須撰文作戰之時，豈知自己即將遭貶，而待被貶再寫？其後貶在陽山，固宜讀書寫作，但，試看他在陽山作〈縣齋有懷〉曰：

> 毒霧恒熏晝，炎風每燒夏。……夷言聽未慣，越俗循猶乍。……嗣皇新繼明，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46]

同年，又作〈五箴〉以自戒曰：

>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47]
>
> 勿病無聞，病其曄曄。……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于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48]

---

[45] 案：貞元十九年冬，韓愈與劉禹錫、柳宗元同官監察御史，劉禹錫〈祭韓吏部文〉曰：「貞元之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間。贊詞愉愉，辨道顏顏。磅礴上下，羲農以還。」《全唐文》卷 610 ，頁 7832 。劉氏謂韓愈早在貞元年間，便已手持文柄，使蜩螗革音，並憶及當年三人相與辨「道」之情景，謂韓愈「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可見，以韓愈當時好辯之銳氣，遇上善於思辯、篤信佛教之劉、柳，亦極可能促成五原之作。

[46] 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臺北：學海出版社， 1985 年 1 月）卷 2 ，頁 229 。

[47] 《韓集》卷 1 ，頁 32 ，〈言箴〉

[48] 同上，頁 33 ，〈知名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見，處蠻荒之地，在瘴毒侵襲下，生活需要調適；遭貶受挫的衝擊，也有待反省、化解。寫作以上詩文，已是貞元二十一年，心態都還如此保守、消極，處在悔過之中，甚至想要歸田，則他被貶之時，是否還會寫〈原道〉這樣富有戰鬥性質的文章？便不能無疑。故筆者以爲，五原未必作於貶後，而更有可能作於貞元十九年左右在京任官時。

但，爲何多數學者皆謂作於陽山，而忽略此一可能？主要關鍵還是「虞卿正著書」一語。《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曰：

> 虞卿……困於梁，……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49]

虞卿困而著書，韓愈以之自喻，可見正在陽山著書。但，所著是否五原？既未明言，也就只能根據有限材料加以推測。五原篇目相同，脈絡相通，又關乎教、道，有重要價值，似具「著書」雛形，因此，前輩學者謂指五原，不無可能。但，筆者以爲，李伯康寄紙筆時，韓愈固正著書，卻不必待李寄紙筆，始能著書；且其在陽山所著，固有可能包含五原，卻也可能另有所指，如《論語注》。[50]故僅據此一語，實不足以證明五原作於陽山，亦不足以排除貶前已作五原之可能性。

至於〈上兵部李侍郎書〉所獻「舊文」，是否五原、或包含五原？就文章性質而言，五原確是「扶樹教道，有所明白」，朱子做此推測，應當可從。而若此

---

[49]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95 年 10 月）卷 76，頁 2375-2376。

[50] 韓愈〈答侯生問論語書〉曰：「愈昔注解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張籍〈祭退之〉曰：「《魯論》未訖註，手跡今微茫。」李漢〈昌黎先生集序〉曰：「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可見，韓愈曾注《論語》，此亦可謂「著書」，亦可「興存聖人之道」；且對被貶之人而言，也不致因此「賈憎」、「媒怨」。張籍謂「手跡今微茫」，可見作於多年以前，或許正是當年被貶陽山時所著，唯未完成，即已離開陽山，遂成臨終未了之心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舊文」確指五原，以常情言，一、兩年內所成者，都還可能視爲近作，[51] 而未必願稱舊文，可見，五原未必作於貞元二十年冬前後，而更可能是貞元十九年左右在京時所作。至於韓愈待命郴州時，有無仍在寫作五原之可能？一則，韓愈在郴州病瘧；再則，韓愈客居李伯康處，常相遊樂宴飲，似難安心著書；三則，此時距向李巽上書時僅兩、三個月，不符所謂「舊文」，[52] 故應可排除此一可能，而將五原寫作時間推定爲貞元十九年左右。

三、〈原道〉是否作於四十六歲以後？

以上推論，定五原作於貞元十九年左右，也就是韓愈三十六歲左右，在京任官時，尚未及於不惑之年。但，也有部分學者提出相去較遠之看法，如童第德謂〈原道〉：

> 他四十六歲做〈進學解〉稱孟子、荀卿優入聖域，對孟、荀還是並稱的。此文則說荀子是擇焉不精，把他排出「道統」之外，以孟子直接孔子，這是韓愈的最後定論，似乎不是三十八歲以前的作品，而是四十六歲以後的作品，確年則不可考了。[53]

案〈進學解〉作於元和八年，時任國子博士。此文仿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之體，以國子先生勸學始，先借諸生之口代抒不平，曰：

> 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

[51] 如韓愈〈與陳給事書〉曰：「幷獻近所爲文〈復志賦〉以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案〈復志賦〉作於貞元十三年，距獻文時已六、七年，猶與其他作品合稱「近所爲文」，可見，稱「舊文」或「近所爲文」，究指多久以前所作，很難確指，只能就常情較喜言新，揣測所獻「舊文」，不是近期所作，而可能眞的比較久了。

[52] 非郴州所作之論證請參看羅聯添：〈韓愈原道篇寫作的年代與地點〉，頁 445 、448 。

[53] 童第德選注：《韓愈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年 10 月），頁 229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迴狂瀾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先生之于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然而……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54]

再由國子先生回答曰：

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55]

文中以孟、荀二儒並稱，謂彼「優入聖域」而不遇於世，雖有自喻之意，但，就行文脈絡以觀，此段重點在抒「不遇」，而非述道統，是否可以據此認定〈原道〉之作在後？不能無疑。鄧小軍嘗爲童說補充論述，謂〈進學解〉「觝排異端」一段「表明〈原道〉的道統思想正在形成。尋墜緒之茫茫，即表示追尋道統。……其道統思想尚未成熟。……尚未創作〈原道〉。」[56] 然筆者以爲，觝排異端一段，是韓愈自述「於儒有勞」，適足以證明韓愈力排佛老、欲爲儒家樹立道統之努力早已「有年」，而且已做出了具體貢獻。如果此時尚未作出〈原道〉，豈能如此誇口？試看當年韓愈在汴州以口舌排佛，立遭張籍質疑，可見，在他決心作〈師說〉、〈送浮屠文暢師序〉公開樹幟傳道、排佛的同時，就須盡快提出完整而有力的理論，始足以爲「師」、爲道統之傳人，也才足以克敵致勝。[57] 皇甫湜〈韓文公墓誌銘〉曰：

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震業光，眾方驚爆

---

54 《韓集》卷 1 ，頁 25 。

55 同上，頁 26 。

56 鄧小軍：〈唐代的中國文化宣言——韓愈《原道》論考〉，頁 58-59 。

57 唐君毅言：「其〈原道〉等文亦確有一氣勢貫注，如有一雷霆萬鈞之力。則其所見于道之義理，雖不能及于深微廣大，而足配道義以生氣。……其于儒佛之義理之未深究，而亦力能闢佛者，亦在于此。」見所著：《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香港：新亞書院研究所， 1974 年 3 月）卷 3 ，頁 1370 。可見，〈原道〉乃具強大攻擊火力，足以致勝的武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姬氏以來一人而已矣。[58]

李漢〈昌黎先生集序〉曰：

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59]

皇甫湜、李漢皆爲韓愈門生，一言「及冠」，一言「比壯」，可見，韓愈很早就開始排佛、傳道、爲古文，這是他一生志業所在，也是他要成名、成功必走之路，自應及早傾力作成〈原道〉等文，而不至於晚到四十六歲以後，始作五原。[60]

再就道統說之發展以觀，韓愈〈重答張籍書〉稱「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原道〉則於詳述「先王之教」以後，總結曰：

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61]

這個自堯、舜傳到孟軻而不得其傳的道統既是「吾所謂道」，可見，此時已暗以己直承孟子，而將荀、揚置於正宗傳人之外。相較於〈重答張籍書〉以己爲孔、孟、揚之傳人，而未提荀子，便知此時韓愈已抑低了揚雄，抬高了荀子，而且，更將自己抬高於荀、揚之上。爲何會有這樣的轉變？試看〈讀荀〉曰：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

58 《全唐文》卷 687 ，頁 8921-8922 。

59 《韓集》，〈序〉，頁 3 。

60 韓愈《祭十二郎文》曰：「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韓集》卷 5 ，頁 196 。可見，韓愈貞元十八年便自覺衰老，卻還只是位卑祿薄，難以養家糊口的四門博士，自更急欲成名，而不願如孔子所言：「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論語・子罕》，《四書章句集注》，頁 114 。

61 同上，卷 1 ，頁 10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62]

韓愈早年因讀孟而尊孔，「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此即〈重答張籍書〉所反映者。後來讀了荀子，謂「在軻、雄之間」，又謂「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則與〈原道〉「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之看法一致，可見，〈讀荀〉必作於〈重答張籍書〉後，而與〈原道〉之作約略同時。[63] 試看韓愈貞元十八年作〈送孟東野序〉曰：「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64] 已提及荀子以「道」鳴；〈原性〉亦論及孟、荀、揚三子之言性，可見，韓愈讀荀，深入思考性、道問題，大約就在貞元十八、九年前後，而其道統思想之成熟當亦在此時。前此，韓愈以己上承揚雄，而不提荀子，至此，眼界更高，氣魄更大，遂以「吾」爲孟、荀、揚三子定位，欲如孔子般「削荀氏之不合者」；且欲直承孟子，以「吾所謂道」傳示天下、萬世，而有〈讀荀〉、〈原道〉之作。

由〈讀荀〉所述讀書經過便知，韓愈始讀荀子，即謂荀子「有若不粹」、有「小疵」，不及孟子「醇乎醇」，而未嘗以荀子爲道統傳人。〈送王秀才序〉亦曰：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蓋子夏之學……流而爲莊周……。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65]

---

62 同上，卷 1 ，頁 21 。

63 〈讀荀〉謂「周之衰，……火於秦，黃老於漢」，與〈原道〉言「周道衰，火於秦黃老於漢」，用語相同，亦可做爲佐證。

64 《韓集》卷 4 ，頁 137 。

65 同上，頁 153 。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言孔子之道由群弟子各自傳播，荀子承自子弓，自亦「聖人之徒」，[66] 可謂「優入聖域」，但顯然不及孟子出於子思、曾子，故韓愈「少而樂觀」孟子書，早就認定「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非荀子所能及。可見，童氏以〈進學解〉爲據，謂韓愈四十六歲時猶以孟、荀並列，「優入聖域」，此後方作〈原道〉把荀子「排出道統之外」，恰與韓愈自述相反，應難成立。

四、韓愈道統說之發展時程

前文曾經指出，韓愈貞元十九年作〈送浮屠文暢師序〉，已以道統之說攻擊浮屠，並指責以柳宗元爲代表之信佛文士。元和五年（810 年），[67] 柳宗元作〈送僧浩初序〉曰：

>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譬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68]

此文可以說是對韓愈〈送浮屠文暢師序〉以道統排佛的回應，雖未提及〈原道〉，但，韓愈〈原道〉高自位置，批評「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言下似較荀、揚更能上承道統。柳氏顯然並不認同，反而肯定揚雄兼取莊、墨、申、韓，而謂「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可見，儘管韓愈不斷爲文闢佛，但，要想贏得勝利，確立儒家道統尊嚴，成爲道統傳人，還須付出更大努力。

元和十四年（819 年），韓愈上表諫阻憲宗迎佛骨，幾被處死，遠貶潮州。次年移袁州，作〈與孟尚書書〉曰：

> 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

---

66 〈讀荀〉語，見上文所引。

67 據羅聯添：《柳宗元事蹟繫年暨資料類編》（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1 年 10 月），頁 111。

68 《柳河東集》卷 25，頁 4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69]

經歷九死一生以後，他終於可將荀、揚完全撇過不提，甚至欲以邁越孟子的決心與勇氣，直承道統。可見，韓愈此書所言，才是晚年最後定論，較諸貞元末期所作〈原道〉，更有進境，童氏以〈原道〉爲韓愈最後定論，顯然不確。

清儒李光地嘗言：

> 韓文公二十來歲，數傳道多一揚雄；三十歲作〈送文暢序〉又少一孟子，都是識見未定。到四十歲作〈原道〉便斬釘截鐵云：「軻之死不得其傳」，卓有定見矣。至〈與孟尚書書〉乃是晚年之作，尚提出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而自己幾幸續在後，荀、揚半字不提起，學識精進如此。[70]

案韓愈生於大曆三年（768年），作〈重答張籍書〉時三十一歲；作〈送浮屠文暢師序〉及〈原道〉時，大約三十六歲。可見，李氏所言二、三、四十之歲皆有誤。至於〈與孟尚書書〉作於五十三歲，李氏謂爲晚年之作，讚其學識精進，固無誤，但言此前之發展，則有待商榷。〈送浮屠文暢師序〉述道統傳至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是就儒家經典至此大成而言，即此便足以質問浮屠「孰傳」，而無須言及孟子。至於孟子以下，包括韓愈在內，「中國之人世守」以至於今者，便是由孔子集大成的儒家經籍與傳統文化。可見，韓愈此文已是「卓有定見」，李氏謂其「少一孟子」、「識見未定」，似有不當。而韓愈既作〈送浮屠文暢師序〉，復作〈原道〉加強闡論，二文約略同時。故論韓愈道統說之發展，宜分三期，前期多一揚雄，中期謂荀、揚不精，而暗以己直承孟子；晚年則不提荀、揚，而逕以己直承孟子。這樣的發展，乃由而立，至不惑，至知天命之精進，而〈原道〉等文之撰述，顯然居於樞紐，正是韓愈學問成熟、視野開闊、勇氣十足、創作力也最旺盛之壯年所爲，無怪乎攻勢如此凌厲。

---

69 《韓集》卷3，頁126。

70 清・李光地：《榕村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6月）卷19，頁342-3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結　　論

綜合以上所論可知，前賢據「虞卿正著書」一語，多謂韓愈五原作於陽山，但就相關詩文、思想脈絡，及其學養、心態、處境以觀，應有更大可能是貞元十九年左右，在京任四門博士、監察御史時所作。至於韓愈道統說之發展，則可分三期以觀：前期作〈重答張籍書〉多一揚雄，中期作〈原道〉謂荀、揚不精，而暗以己直承孟子；晚期作〈與孟尚書書〉則不提荀、揚，而逕以己直承孟子。〈原道〉氣勢滂礴，火力強大，乃三十六歲之壯年所爲，童第德謂〈原道〉作於四十六歲以後，乃「最後定論」；李光地謂三十歲作〈送浮屠文暢師序〉、四十歲作〈原道〉，皆不可從，韓愈道統說之最後定論當非〈原道〉，而爲〈與孟尚書書〉。

（責任校對：方韻慈）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95年10月。
＊唐・韓愈撰，民國・馬其昶校注：《韓昌黎文集校注》，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韓昌黎集》，1975年3月。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年12月。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臺北：里仁書局，1970年10月。
＊宋・朱　熹：《昌黎先生集考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
宋・朱熹集注：《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0月。
清・董誥等奉敕編：《全唐文》，臺北：大通書局，1979年7月。
清・徐　松：《登科記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8月。
＊清・李光地：《榕村語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6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臺北：學海出版社，1985年1月。
王文濡校註：《古文辭類纂評註》，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3年7月。
＊吳文治編：《韓愈資料彙編》，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年4月。
＊童第德選注：《韓愈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10月。
華忱之、喻學才校注：《孟郊詩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12月。

二、近人論著

＊方　介：〈談韓愈以文爲戲的問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6期（2000年3月）。
＊方　介：〈皇甫湜的聖人觀〉，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2期（2003年3月）。
＊方　介：〈有鬼有物——韓愈〈原鬼〉及相關詩文探析〉，《臺大中文學報》32期（2010年6月）。
洪　流：〈韓愈五原始作於陽山〉，《韓愈與嶺南文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9月。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香港：新亞書院研究所，1974年3月。
＊陳弱水：〈〈復性書〉思想淵源再探——漢唐心性觀念史之一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3分（1998年9月）。
張清華：〈韓愈的道、道統說及五原的寫作時間辨析〉，《韓山師範學院學報》26卷4期（2005年8月）。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
＊鄧小軍：〈唐代的中國文化宣言——韓愈〈原道〉論考〉，《孔子研究》（1991年4月）。
劉眞倫：〈五原的創作與道統的確立——兼論韓愈陽山之貶與文風之變〉，《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3卷1期（2006年1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羅聯添：《柳宗元事蹟繫年暨資料類編》，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1年10月。

＊羅聯添：《韓愈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年11月增訂再版。

＊羅聯添：〈李翺年譜〉，《唐代詩文六家年譜》，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年7月。

＊羅聯添：〈張籍〈上韓昌黎書〉的幾個問題〉、〈韓愈〈原道篇〉寫作的年代與地點〉，《唐代文學論集》下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5月。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en, J.-S. (1998, September). Li Ao's *Fu-hsing shu* and the intellectual milieu of Medieval Chin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9*(3).

Deng, X.-J. (1991, April). *Tang dai de zhong guo wen hua xuan yan —han yu yuan dao lun kao* (Declaration on the Chinese 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A survey of Han Yu's "Yuan tao"). In *Confucius Studies.*

Fang, J. (2000, March). Han Yu: Writing essays as playing game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16).

Fang, J (2003, March). Huangfu Shi's concept of the sag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22).

Fang, J (2010, June). Ghosts exist as strange creatures do: Reevaluating Han Yu's "Yuan Gui" and related writings. *Bulletin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32.*

Li, G.-D. (1995). *Rong cun yu lu* (Quotations from Jung-Tsun). Beijing: Zhonghua Book.

Lo, L.-T. (1981). *Han yu yan jiu* (Han Yu studies) (2nd ed.). Taipei: Student Books.

Lo, L.-T. (1986). Li ao nian pu (A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Li Ao). I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ang dai shi wen liu jia nian pu (Chronological biographies of six authors in the Tang Dynasty). Taipei: Xue-Hai.

Lo, L.-T. (1989). Zhang ji shang han chang li shu de ji ge wen ti (Several problems concerning Zhang Ji's letters to Han Yu). In *Tang dai wen xue lun ji* (Collected literary criticisms on Tang literature). Taipei: Student Books.

Lo, L.-T. (1989). Han yu yuan dao pian xie zuo de nian dai yu di dian (The time and place of Han Yu's "Yuan dao"). In *Tang dai wen xue lun ji* (Collected literary criticisms on Tang literature). Taipei: Student Books.

Ma, C.-C. (1975). *Han chang li wen ji jiao zhu* (Revisions and annotations of Han Yu's complete prose works). Taipei: He-Luo.

Qian, Z.-L. (1985). *Han chang li shi ji nian ji shi* (The poems of Han Yu arranged chronologically with collected annotations). Taipei: Xue-Hai.

Tang, J.-Y. (1974) *Zhong guo zhe xue yuan lun: yuan dao pian.* (Tracing the cause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cing the cause of the Tao). Hong Kong: Institute of New Asia College.

Tang, Y.-T. (2007). *Sui tang fo jiao shi gao*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he Sui and the Tang Dynasty).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Tong, D.-D. (1997). *Han yu wen xuan* (A selection of Han Yu's prose). Beijing: The People's Literature.

Wu, W.-Z. (1984). *Han yu zi liao hui bian* (A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about Han Yu). Taipei: Xue-Hai.

Zhu, X. (1985). *Chang li xian sheng ji kao yi* (A textual research on Han Yu's completed work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